

CONFUCIAN FILIALITY

儒家孝道

高望之 著
高亮之 高翼之 译

本书荣获2011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入选项目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CONFUCIAN FILIALITY

儒家孝道

高望之 著 高亮之 高翼之 译

本书荣获2011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入选项目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孝道/高望之著;高亮之,高翼之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214-07494-2

I. ①儒… II. ①高… ②高… ③高… III. ①儒家—
孝—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B823.1②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0900 号

书 名 儒家孝道
著 者 高望之
译 者 高亮之 高翼之
责任编辑 彭晓路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494-2
定 价 1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高望之,1927年9月18日生于上海。1945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系。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主修西语,副修历史。1951年毕业,在中央军委外联处工作两年,为朱德、聂荣臻当翻译。转业后,任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主任秘书五年。尔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二十年,从事中西交通史和宗教史的教学与研究。197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学术委员、研究室主任。198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并先后在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戴维斯加州大学任客座教授。三十多年来,他潜心从事中国各宗教间的比较研究,并首创将之定名为“中国教际学研究”(Chinese Interfaith Studies)。所谓“中国各宗教”,主要是儒教(它不是一种 religion,是有争议的;但它是一种 faith,则并无争议)和道教,以及从西方传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1997年后,他专攻藏传佛教,着重于研究它与印度大乘教和密教的渊源关系。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上的犹太教和犹太人》、《关于中国犹太人的若干问题》等。译著有:《埃及古代史》、《世界史编年手册》等。参与编辑《英汉大词典》。2007年5月18日因病在美国旧金山去世,留有《儒家孝道》(英文稿)及《宗喀巴佛教学说》等手稿。

以此书怀念我已故的双亲，
并赠予我的兄弟姐妹——

沛之、亮之、翼之、鑑之、澄之、齊之、全之

序 一

挚友望之，谢世已经两年半了。我们是同时代人，经历了民国时代、抗战八年、抗战胜利后的“五子登科”时代、解放战争中的“金圆券”时代，新中国成立后的朝鲜战争时期、“大跃进”时期、反“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又经历“九一三”事件、1976年伟大领袖逝世、粉碎“四人帮”、邓小平主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年，望之从北大历史系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我们朝夕共事。因为都来自上海，又有圣约翰大学的渊源，自然就接近起来。他的学术兴趣与我相近。听他说起过他对《孝经》的研究，我因对儒家经典疏于研究，对《孝经》不敢问津，不敢置一辞。不久，我调到院部从事国际学术交流工作，和望之相处的时间少了。望之比我小一岁，但他在学术上是我的兄长。1986年他到美国，1990年我也到美国，在基督教卫理公会俄克拉荷马市大学任教。我们两人共同做了一桩事情，就是联合香港浸会大学哲学教授费乐仁和加尔文学院宗教与东亚哲学教授欧迪安教授，共同翻译冯友兰先生所著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历时数年，最后竣稿。我们在欧迪安教授家里开定稿会议。我还到旧金山看望望之，并在他家寄宿。听他讲，他家兄弟多人；我也讲，我母亲在兄弟姐妹中间最小，排行第十。所以我也知道，作哥哥十分不易，样样事情，让弟弟妹妹在前，是哥哥的本分；而任何事情，做好做坏，则是哥哥的责任。想到望之，从来都是谦谦君子，大概从小在家里，已经养成了他温良敦厚的个性。他从来就是这样一个人。

近二十年来，我所接触的多半是西方文化史。从中有三个比较深的

感觉：

第一，在西方历史中，没有一个长久不变的、大一统的皇帝做权力中心。欧洲政治权力的中心，从公元 476 年罗马帝国灭亡后，到公元 800 年才建立起查理曼大帝的统治，在此期间，实际是各地一大批地方性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里实行地区性统治。欧洲中世纪罗马教会教皇的权力凌驾于国王之上。15 世纪意大利城邦的大家族挟经济实力而声势赫赫，以民族建立的国家是 14 世纪以后才兴起的。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各国知识分子独立而游走于地方诸侯之间，有很大的自主性，不是必须依附于皇帝。中国从秦始皇起，帝王统治贯穿两千年，封建帝制稳定的中心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各种社会体制如中央与地方官员体制、各级官僚体制、知识分子体制，统统依附于专制帝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但专制统治的影响根深蒂固，长期渗透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专制帝王一统天下的各级“一长制”统治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官僚听命，只求为己，发展现代民主，任重而道远。

第二，看一个国家，涉及怎样认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社会与政治，哪一个比较稳定呢？看来，社会是更基本、也比政治更稳定的一种社会机制。但在 20 世纪下半叶，在有些国家里，这种关系被颠倒过来，政治统帅一切，党的一元化领导，领袖语录就是圣旨。诚然，政治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互相影响，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像积木那样，可以任人倒置的。《大学》里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看来似乎只是一个先后关系问题，其实，它是对或错的问题。“文革”时期流行一种说法：“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硬要把政治上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说成血缘关系，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说成是封建式家庭关系；这样，利用人们对不同性质社会关系的无知，把社会搞乱了。社会关系的混乱，是比政治混乱更深层的混乱。现在美国民主党大佬爱德华·肯尼迪去世，美国总统奥巴马失去靠山，民主党内部乱了起来，奥巴马也无可奈何。这是政治混乱，但还不是美国社会根本混乱。美国社会风气中也有混乱现象，但还未成为美国社会体制的根本混乱。当今世界经济大转型，旧的体制在世界和中国都在转变，转变的性质却会有所不同，这是需要认真比较、分

析的。

第三,人性的异化和复归,或说文化对人的精神的提升关系。在学习西方文化史的时候,到欧洲的任何一个大教堂或中世纪修道院里走一趟,都会发现,它把建筑、美术、音乐和宗教,几乎可以说是铸成一个浑厚的整体;使人意识到个人的渺小,意识到在个人以外,还有一个“大”,大到了“无限”。能够意识到这个“无限”,对人的精神有一种提升的作用。这种提升,可以使人摆正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与其他人的关系。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渺小的人,就敢于摆弄别人、摆弄世界。这大概是所谓“虔敬”的本来的含义,就是意识到“有限”的渺小。这和我到过的许多中国佛教寺庙的感觉不同。在中国,进佛教寺庙,往往给人一个感觉是,怎么这样俗(我通过弘一法师,敬重佛学的许多道理,但并不信奉佛教的“出世”,而是信奉在现实中的永恒)!如同游人到安徽黄山,希望这里和上海的十里洋场不一样。发现摆小摊、卖假古董不说,还代卖电动玩具,则会说:“怎么?把社会的俗气带到这块地方来了!”人们生活在纷纷扰扰的世界里,希望有些时候能够跳出这一切,使自己冷静地看看自己。我把这称作“人性的复归”。这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人的本性、文化的本性;就是使人的人性得到“复归”。按我领会,这也就是诗的作用,或说艺术和文化的作用。人们都知道康德写的三个“批判”,但给我最大帮助的却是他所写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遗憾的是,人们读近代德国哲学,往往忽略了康德的贡献。

这三点是我学习西方文化史的一点体会。

从政的人喜欢立竿见影;读书人喜欢刨根问底,甚至要问:“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大概够人类继续研究几个世纪。进入近代世界,皇帝的号令不灵了,要找更多的人来议事了。政治家、贵族以外,哲学家又加上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我是谁?”直到现在,也没有扯清楚。20世纪末又扯出了电脑网络、信息社会、全球一体化,等等。这时候,望之多年前论述的中国儒家经典《孝经》要出版,这是什么意思呢?

细细想想,越是在风大的时候,人走路就越要站稳脚跟。人所遇到

的问题,归根到底,首先是人的问题,是人在生命中的问题,是人在变化多端的世界面前感到迷惘而产生的问题。世界的变化总是走在人的认识的前面,人总是落在后面,这是问也问不出究竟的问题,重要的是自己站稳脚跟。脚跟站在哪里才是站稳了呢?答案可以说,只有站在维护和帮助生命发展的方面。维护和帮助生命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感到现状不利于生命发展的地方,二是生命需要自由才能发展,这就必须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再细细想想,前者就是对现状的批判;朝什么方向、怎样发展,则是根据前者而来的。人是多种多样的,就是说,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孩子对颜色十分敏感,适于发展绘画的才能;有的孩子则喜欢动手做小东西,适于发展工程方面的才能。细心的家长会仔细观察孩子,发现他们的特长。有的父母不去仔细观察,就埋没了孩子的才能。这是现代教育学方面的功能。如果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教育理论,这是很可笑的歪曲。试想一下:屈原受了什么西方影响?司马迁受腐刑,是由于什么西方影响?苏东坡被贬海南,是由于什么西方影响?岳飞抗金,是由于受了什么西方影响?这些人,由于正义感,看出社会的不合理,坚持正义。正是因此,才推动了社会前进。在西方历史上,也是靠同样的人,推动了西方历史的前进。总之,任何东方或西方社会,只有不断除旧,才能迎新;只有不断除旧迎新,社会才能不断进步。这是最浅显的道理。只要是真正进步的人,一定务实,一定宁要少些,也要好些,这也是最浅显的道理。但是,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整体。新的,不能脱离历史,人是在历史中创新;历史和创新是一体的。

思维是人的特性,思维的动力和感情分不开,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通情达理”,通情而后能达理。两千一百多年前,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便说:“情者,性也。”“理”和“情”是分不开的,人对事情的思想往往由“情”而来;例如母亲为对孩子的爱,而不惜牺牲自己,便是由“爱”而来。婴儿出生到世界上的第一个“情”,便是寻找自己的母亲,这是人与世界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终身的联系。这就是道德的开始。一个人,只有懂得爱自己的母亲,才能爱任何其他的人,否则都是空话。人身处异国,首先想念的是故土。人出生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总觉得“妈妈”就在自己旁边;无论做任何事情,心里第一想到的是:母亲会为这事怎么看我?这是人判断是非的、最后的、最高的标准。

望之用了多年研究和论述《孝经》,把自己的心血献给父母亲,赠给兄弟姐妹。他心里是怎样想的呢?望之,望之,我们不久还会相聚。我们共同参与翻译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英译本还未出版,我总觉得自己还欠着你一笔债。但是在见面时,你也不要忘记告我,我这样解释你的《孝经》献辞,你同意吗?

赵复三

2009年11月感恩节

序 二

2009年6月21日我接到高翼之先生的一封电子邮件,信中翼之先生自我介绍说是高望之先生的弟弟,因翻译望之先生一部英文手稿——《儒家孝道》,书中有两处引文涉及明末来华传教士的两本著作,而听说我这里有这两本书,希望借阅核对一下。高望之先生是我的前辈学人,1955年我入北大哲学系读书时,他时任校长办公室主任。那时我就有机会与先生接触,给我的印象是先生待人和善,没有架子。1960年我毕业留校任教,得知先生已调到历史系任教,从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但由于我留校后不久即下乡参加教改试验,参加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参加“四清”运动等,很少在校内。只是有时回校办事,偶尔在校园里能见到一下先生。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听说先生因之前的工作关系受到了牵连,因此至“文革”结束前,我没有机会再与先生见过面。“文革”结束后,1979年先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而我当时也开始把一部分教学科研的重心放到佛教等中国宗教研究方面来,所以有时去宗教所参加活动,又与先生有过几次见面的机会。而自先生去美国后,就再也没有与先生见过面了,以后又得知先生在美国病逝,深为叹息,然我对先生一直充满敬仰之情。这次接到翼之先生的信以后,有幸知道了先生在美国的一些教学研究情况,更兴奋的是得知先生还有一些中英文遗稿存世,而翼之先生等家人正在尽力翻译和联系出版。翼之先生信中所求之事,对我乃举手之劳的事,所以当下我就把有关著作的电子文本传了过去。

两个月后,翼之先生来信告知《儒家孝道》一书已由他与他三哥高亮

之先生合作翻译完成,并联系到了出版社,希望我能写一篇序,不久就把译稿寄了过来。当我把译稿粗粗翻了一遍后,我就答应愿意为此书写序。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中国年轻人对儒家孝道的了解,不比一般外国人多,所以望之先生这部专门向外国人介绍儒家孝道的书,也很适合中国的一般读者,值得在国内出版和推荐。而当我仔细读了一遍后发现,这不是一本简单介绍性的著作,它同时也是一部有着很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它不仅适合一般的读者,即使对这方面有研究的专家,也会从中得到许多的启发。例如:书中对《孝经》版本源流的考辨和比较,对儒家孝道思想资料的钩稽,对儒家孝道思想建立的基础、形成的社会背景、传承的努力等,以及孝道对民众的教诲、对女性的特殊教育,在邻国的传播等一系列问题的细致论述,都极见功力、极有见地。尤其是本书末后部分,把儒家孝道与道教、佛教,乃至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有关孝的思想进行的比较研究,是前人研究得很不够的方面。而通过本书的比较研究,可使读者对儒家孝道有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具有开创性意义。

由于当时手边工作很多,一时抽不出时间写序,于是就搁了下来。后来翼之先生又来信说,出版遇到一些问题,暂时出不了了,于是我也就偷懒暂不动笔了。今年1月21日翼之先生又来信告知出版社已确定要出版此书的消息,并希望我在春节前能写好序言。这次不能再拖了,于是挤时间把全书又看了一遍。儒家孝道思想的根本含义是报本、感恩。不忘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孝敬自己,那就必须从自己做起,只有你孝敬你的父母,你的子女才会孝敬你,孝道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因果不爽。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正确认识孝道,懂得孝道在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方面的重要意义,认真地去实践孝道。也因此更觉得此书的出版一定会有助于当今国人正确地去了解儒家,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观念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楼宇烈

2010年2月3日

对本书的推荐(摘译)

对儒学稍许熟悉的人都知道,孝道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全面论述这一主题的西方学术著作。所以,我为有幸能评论高望之教授所著《儒家孝道》书稿而感到高兴。

阅读了本书书稿后,我的第一印象是作者采用了一种新的和明智的方法来论述这一主题。这种方法是传统古典研究与现代方法学(特别是不同信仰之间和不同东亚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的结合。本书书稿表明,这种方法显然在研究古老遗产时是很合适的。

本书书稿的主要部分着重于对儒家孝道进行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体系的分析,这将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价值观。就我所知,这样的分析在学术著作中是没有前例的。

最后,我强烈推荐本书稿尽快出版,因为它对有关学者(包括东亚各国学者)很有用。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宗教学系教授

于君方(Chun-fang Yu)

2007年5月26日

读完高望之教授的《儒家孝道》书稿后,我认为它是对这一主题的透彻和卓越的分析,值得出版。

高教授搜寻了传统中国儒家思想中关于孝道的所有可能搜寻到的参考文献,并给予读者有创见的陈述与翻译。他进而讨论了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其他传统信仰。我认为这是该领域中用英文论述这一非常重要的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首次尝试,无疑将是众多学者和非专业人士很有兴趣阅读的著作。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学系荣誉退休教授

丁爱博(Albert E. Dien)

2002年6月22日

前言

我不认为自己能胜任写一部关于儒家孝道的著作，因为我不是一名儒学家、一名伦理学家、一名社会学家，也不是一名人类学家。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专心从事的领域是中国的教际学研究(Chinese Interfaith Studies)。然而，考虑到在英文或其他西方语言中，全面阐述这一儒学重要题材的书籍非常少，我感到有责任来做这个尝试。在进行中，我总难以摆脱因感到不能胜任而生的些许惶恐之情。不过，我还是有一项优势，那就是：我成长在一个仍然笼罩着儒家孝道气氛的社会中，而当这个社会中断时，我已经是22岁的成年人了。1949年之后，我有几次在农村居住几个月的机会，在那里，我亲眼见到中国农民怎样默默地坚持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习俗，而不顾来自上面的禁令。因此，在这部书中所表达的许多观点是就我个人经验而形成的。

《孝经》是一部不到两千字的小型经书，所以我认为把它的原文收入本书是方便和合适的。这样，在我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难题：我应该选择《今文孝经》还是《古文孝经》呢？经过反复的考虑，我决定采用后者。我并没有十足的理由这样做，但我感到，尽管两个文本大体相似，《古文孝经》还是比较好一些。以“闺门章第十九”作力标题的那一章中只有引自孔子的两句话，在《古文孝经》中保留了，而在《今文孝经》中是没有的。古代的及后来的《今文孝经》文本支持者们尖锐地批评那一章的“伪劣”和“粗俗”，但我认为这种斥责是不公正的。《孝经》已被翻译为拉丁文(Noël, 1771; 等等)、英文(Bridgman, 1835; Faber, 1878—1879; Legge, 1879; Chen, 1908; Makra, 1961; Lee 1973; 等等)、法文(Cibot, 1779; Le-

ontief, 1779; de Rosny, 1889; Cholon, 1911; 等等)、意大利文 (Valenzani, 1878; Tomassini, 1974; 等等)、德文 (Wilhelm, 1940; 等等) 和其他西方文字。就英译本而言, 它们都是据《今文孝经》翻译的, 因此, 我必须自己来进行《古文孝经》的英文翻译。然而, 我并没有要超越以往英译本的愿望, 对于它们, 我都心怀敬意, 因为每种译本都有各自的优点。

对于本书中经常出现的若干木语需要作一些解释。关键性的“孝”字, 它的语原学的意义是“儿孙供养长辈(父亲, 母亲)”。但在后来的应用中, 它的意义变得广泛得多。它是一种重要的和基本的价值观; 是一种子女的虔敬和顺从的美德; 是一种子女对于双亲(不论是在他们生前还是死后)的神圣责任, 而这种责任还包括对双亲提出必要的和温和的规劝; 等等。现在, “孝”字的惯用英文翻译是“filial piety”, 但它只表达了这个中文木语的一种涵义, 即子女的虔敬。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 Maurice Freedman 说: “‘孝’被拙劣地译成‘filial piety’, 这样的英语表达, 使‘孝’具有虚情假意地顺从的味道。”他和 Arthur Wright 都偏爱英文词“obedience”(Freedman, 1966)。有些学者确实选择了“filial obedience”来翻译“孝”字。可是, 用它来表达“孝”, 还是太狭窄了, 所以也不能使人满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一个新的英文词“filiality”在学术出版物中出现。我想, 对于“孝”来说,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木语, 尽管它有一点点含糊。所以, 在本书中, 包括书名, 我决定采用“filiality”来代替“filial piety”。

当英文木语“ancestor worship”(祖先崇拜)被使用于中文语境中时, 也引起争论。在 *Random House College Dictionary* 的 1983 年修正版中, “worship”的第一定义是: “献给上帝、圣者或任何神圣对象的虔诚的尊敬和效忠。”在中国的远古时代, 祖先崇拜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性的, 但后来它的宗教性质逐渐地减弱了, 到了现代, 中国人一般不把它看成是一种宗教礼仪。“孝”被当代中国各种宗教的信仰者所接受, 不论他们信仰的是什么宗教。有些学者建议用另外的英文木语“ancestral cult”(祖先膜拜)和“the cult of the dead”(对死者的膜拜)。可是, 它并不比“ancestor worship”好多少, 并且, 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死”字是不喜

欢的。我认为,“ancestor-serving rites”(敬奉祖先的礼仪)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在本书中我并不准备采用它。读者常常会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英文出版物中发现“ancestor worship”这个术语,如果他们知道一些中国历史,尤其是18—19世纪的“礼仪之争”(Rites Controversy),他们应该不会误解其含义。

此外,中文术语“封建”也是一个问题。从历史上讲,中国的封建时期应该仅限于周朝。但是在中国大陆,遵循马克思关于五个连续的社会制度(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人们习惯于将“封建主义”表示从战国到19世纪中叶大约2300年的长久时期。这带来了许多困扰。我在本书中不会重复这样的误用。

高望之